

當前台灣海峽兩岸軍事情勢之分析

丁樹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近來，有關中共向前蘇聯大量購買新式武器的報導頻傳。這包括已確定購入的一中隊二十四架SU-17，與將另外購買的四十八架同型戰機，及正在交涉的四百輛T-72戰車、大型航空母艦、M-31戰機，與僱用二百位前蘇聯核子武器專家等。中共這些舉動使國人擔心將不利於我方的安全。

也有人指出，不只是大陸，我方與東南亞國家也在進行規模不小的軍事現代化。他們擔心，兩岸大規模的軍事國防現代化，將對兩岸，乃至於東亞區域的穩定帶來衝擊。

本文擬探討海峽兩岸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政治軍事矛盾現象。此一矛盾現象是，一方面雙方在政治上降低緊張氣氛，但在軍事上卻從事大規模的現代化。探討焦點為雙方軍備競賽的屬性，軍事對峙氣氛降低原因，雙方軍備現代化的背景與雙方現代化的成果等。

一、軍事對峙氣氛的降低

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兩岸軍事對峙氣氛的降低各受內外因素之影響。就中華民國而言，國際關係結構形成了很大的制約。自一九五八年台海第二次危機以後，美國已不願再介入兩岸軍事衝突之中；而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美國追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使中華民國無法再自美國取得與中共軍事對峙的支持。相反地，中華民國必須針對美國的政策而採取相對因應措施。這使中華民國轉而採取守勢作為，而不能如五〇年代初期，對中國大陸採取軍事襲擊的做法。

美國政策的調整，也使中華民國面臨國際孤立的危機。美國與中共於一九七二年開始的關係正常化使許多國家調整與中

華民國的關係，使台北逐漸面臨國際孤立的危機。一九八二年中共與美國簽訂「八一七」公報，更對台北造成另一次打擊，使台北不能再期待美國會出售較先進的武器給台北，雖然美國政府對此公報做了一些有利於中華民國的彈性的解釋。^①在國際孤立與軍售無著的情況下，中華民國勢必得調整其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態度，避免刺激中共當局，以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

② 台北的避免刺激中共當局不僅不限於軍事方面，也表現在對內的政治態度上。中華民國一再公開宣稱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並在最近以前，曾逮捕主張與組織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士。^③北平當局設定了許多對台用武的條件，其中之一即為臺灣宣布獨立。^④中華民國化解台獨呼聲的作法，已由早期的全面禁止到近年的加速內部政治改革，與實行「務實外交」政策，以爭取國際地位化解國際孤立。

中華民國內部的改變也間接促成台海雙方政治軍事有形對峙的降低。四十餘年來的世代變遷，國民黨內與共產黨處於長期鬥爭的老一代政治人物已逐漸凋謝，新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政治人物已崛起。新一代的政治人物缺乏與中共鬥爭的歷史經驗，沒有背負歷史負擔與陰影，而且許多曾在西方受教育，意識形態色彩淡薄。因此，他們會以較實際態度處理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威脅。

其次，兩岸日益頻繁的經貿活動也相當程度地制約著兩岸軍事對峙。台灣企業界面臨日益高漲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及國內土地與勞力成本增長等問題，而中國大陸却有低廉勞力與生產成本，以及同文同種的方便，使許多企業家將目標轉向中國大陸。特別是，近期中共當局有意開放「國內」市場與台商和外資企業，更形成推波助瀾的作用。中華民國政府則有不同的期盼：希望透過經濟交流爭取大陸同胞對台灣的向心力，與改變中共政權的體質。也就是說，希冀以經濟，輔以文化交流，達成改變中國大陸。手段的改變自然使軍事的作用降低。

此外，台灣商人在大陸東南沿海的密集投資也勢必影響軍事作為的選擇。東南沿海因地利與風俗之便，成為台灣商人投資最密集地區。台灣軍事力量無法對中國大陸做遠程打擊，而近程範圍內又儘多為經濟活動，特別是台灣商人所投資者，這相當程度地限制了可能的軍事行動。

註① 裘兆琳，「中美政治、軍事關係演變」，中美關係報告，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八五年），頁一—一七。

註② 有關「不挑起」「不刺激」的觀點，國防部長陳履安先生曾說，「……沒有人能保證戰爭不會發生，只要有一兩個屠夫，防範的辦法只有不去刺激他。」……我們是儘量不挑起戰爭，沒必要逞一時之快，但絕不能沒有必要的準備。」這應該能反映八十年代中華民國的政策。聯合報，民國八十年四月十五日，第二版。

註③ 這些逮捕行為自然也包含禁止他們向中華民國政府合法性的挑戰。

註④ 有關中共武力犯台聲明之整理，請參閱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編），對中共所謂「不排除使用武力犯台」之研析，第五版，台北，民國八十年六月。

中共當局降低軍事對峙氣氛也有其原因。就其軍事本身而言，經過一九七九年「懲越」戰爭的教訓，中共深知其軍隊弱點與戰力不足處，^⑤侵台將付出太大的成本。何況，中共的「懲越」戰爭激起了美國國內同情台灣的力量，加速了「台灣關係法」的制定與通過。^⑥

就中共當時的國際戰略而言，台灣不是其主要威脅。七〇年代中期，特別是北越以武力統一南越，及美軍撤出越南以後，中共就開始呼籲東南亞各國，要「前門拒狼，後門拒虎」^⑦——小心越南成爲東南亞的另一禍患，特別是可能成爲俄國在全球擴張的代理人。隨後，中共外交上強調建立「反霸」陣線，^⑧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中共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爲止。因此，中共不致升高與中華民國對峙氣氛。

中共於八〇年代以來推行的經改政策也制約著其對台之政策。中共的經改由農村而城市，同時要將國民生產毛額在本世紀末「翻兩番」。爲此，中共強調需要有和平的國際環境以致力內部建設，乃設法保持與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之友好關係。^⑨

中共對台採行的「一國兩制」政策也影響其可能採行的軍事路線。「一國兩制」在政治方面以中央姿態接管香港與台灣，使兩者均成爲地方政府。但在經濟方面，則強調保持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中共除想穩定兩地民心外，在相當程度上，相當了解兩地對中共經濟發展上的幫助，^⑩而希望能完整接收，以利其經濟現代化。因此，軍事路線與「一國兩制」勢將背道而馳。

中國大陸學者明白不諱言地指出這個希望。劉江水在討論中國大陸經濟在未來東亞，甚而全球競爭中時指出，「一九九七年香港將和中國大陸統一，如果海峽兩岸經貿關係加深或走向統一，九〇年代後半期東亞經濟將出現新的格局性變動，中國的地位和作用無疑將大增。」^⑪

一九七八年底美國與中共當局宣布建交對中共是一個有利的機會。在宣布建交之後，中共對台政策更強調「懷柔」與

註⑤ 有關於此的研究，請參見 King C. Chen,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pp. 146~149.

註⑥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79, p. 1.

註⑦ *Peking Review*, June 13, 1975, pp. 9~10.

註⑧ Joachim Glaufitz, "Anti-Hegemony Formula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16, No. 3 (March 1976), pp. 212~215.

註⑨ 蘇起先生認爲，中共基於現代化的需求，而非傳統權力平衡的角度，自一九七九年起就主動尋求與蘇聯的關係正常化。同時，中共追求和解以建立和平國際環境的努力一直持續不輟。蘇起，「戰略三角與中共對蘇政策」，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三卷，第三期（民國七十九年九月），頁一六〇~二七。

註⑩ 有關香港經濟對中國大陸重要性的分析，請參見梁玉英，「香港在中共沿海經濟發展策略中的地位問題」，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一卷，第一期（民國七十七年七月），頁二二~二七。

註⑪ 劉江水，「九十年代東亞經濟及中國面臨的挑戰與機遇」，現代國際關係（北平），一九九〇年，第一期，頁二六~二八。

「招安」方式希冀以此拉攏台灣人心，而以最低代價達成統一的目標。然此策略未能奏效。

一九八七年中華民國開放探親後，兩岸交流狀況也使中共不必急於製造軍事對峙氣氛。中共或許認為，開放探親及隨之而來的各種交流活動可以促進台灣對大陸的認同，而使統一水到渠成地朝向大陸希望的方向發展。

目前兩岸交流相當頻繁。在社會方面，台灣赴大陸者在過去四年中已超過二百多萬人次，而隨著政府對限制探親身分的日益放寬，赴大陸的台灣人士將越來越多。經貿方面，四年來經過香港的間接貿易大幅成長，貿易額已達到一百二十億美元，累積的貿易盈餘幾乎與我國對外貿易總盈餘等值。透過香港間接投資於中國大陸者已超過二十億美元，而且這個數目還會增加。^⑬

中共也認為，台灣商人在大陸大量的投資與經貿活動，可增加中共對台政策的籌碼；使台灣內部出現親中共的利益遊說者，分裂台北的大陸政策。這是中共自一九九〇年七月重新規劃對台政策時寄予厚望之所在：吸引台資、台商赴大陸投資、設廠與貿易，以促成兩岸早日三通。^⑭換句話說，中共期望以兩岸交流衍生的問題達到「以民促官」，而改變中華民國既定的大陸政策，特別是改變以「國家統一綱領」規劃的交流三階段原則。^⑮

由此看來，八〇年代以來兩岸降低軍事對峙氣氛僅係雙方策略的調整，是因應內外因素與自身軍事力量不足^⑯所致，而不是雙方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所致。也就是說，雙方競爭方式以另外一種型式出現，取代了五〇年代赤裸裸的軍事衝突與戰爭。中共仍視台灣為其一省，因而仍強調不承諾放棄武力犯台，以實現其統一的目標。然而，也因為中共這種認知，使中華民國加速其軍事現代化的脚步。

二、雙方軍事現代化的原因

兩岸軍事互動處於不對稱的關係。就總體力量、資源、人口、面積與軍力相比，中共都比台灣佔優勢。就雙方軍事戰略目標而言，中共以區域為考慮因素，包括蘇聯、日本與美國，台灣並不是其主要的目標。但中共却是台北的唯一戰略目標，

註⑬ 引自馬英九，「四年來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四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年十二月），頁一〇〇～二六。有關台灣商人在福建的投資分析，請參見方山，「台商對閩投資之概況」，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三卷，第四期（民國七十九年十月），頁三九〇～四一七。

註⑭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六日，第三版。

註⑮ 宋國誠，「一九九〇年代中共的對台政策」，載於周玉山等編，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年），頁四一〇～四二七。

註⑯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於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接受香港百姓雜誌社長陸鏗訪問時明白指出，中共經濟力量不强、國防不足與對台政策的關係。引自新聞局（編印），同註④，頁一七。

為台北集中全力應付的對象。因此，中共大規模軍事現代化不是以台灣為主要對象，雖然其現代化的後果對台灣有深度的影響。

台灣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軍事現代化採取漸進而且幾乎完全依賴向美國採購。¹⁶八〇年代以後，則開始進行大規模而且技術上採取跳躍式的現代化計畫。其原因有幾項。第一為國際孤立與「八一七」公報的刺激。國際孤立使台北更需依靠自己的實力，以防衛自己的安全。「八一七」公報限制了美國對台軍售的質與量，再加上中共在世界各地阻撓中華民國對外採購武器，使台北燃起了朝向國防自給自主的目標，開始了在技術上採取跳躍式的軍事現代化做法，強調引進高級軍事技術。

第二為現有武器已陳舊，無法滿足未來的需求。¹⁷其典型的例子為戰機。戰機主力F-104與F-5E分別為六〇與七〇年代的產品，但此後即沒有新機種可供運用，使空軍形成斷層現象。何況，使用多年後，飛機自身的安全都成問題，雖然空軍曾對之進行大規模的延壽計畫。¹⁸

其次則涉及國際環境的認知。中共於一九八九年與前蘇聯和解，當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時正式完成。台北預期，中共與印度、越南的關係亦將隨之改善，這使中共可將注意力轉移到台北，以在本世紀末以前完成中國的統一。¹⁹

外在事件增強了中華民國的憂患意識。伊拉克佔領科威特引起台灣極大的震驚。若此佔領行為未被制裁，台北擔心中共會援以引用。同時，中共也可引用伊國的突襲入侵方式，短時間佔領台灣。此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對比很像科威特與伊拉克，使中共軍方形成「有錢不如槍，講理不如講力」強權主義的認知。²⁰這使台灣擔心，中共會不顧台灣經濟對其現代化的可能幫助，而以武力達成「為統一而統一」的歷史使命。²¹

中共的對內舉措也令台北感到不安。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民運分子時中共表現出的不理性，即使這是在國際媒體注視下。這使人聯想，中共也能在國際反對情況下，對台灣進行武力侵犯，而國際也可能於中共武力佔領台灣後的二、三年內，再度恢復與中共的關係，如同中共在「六·四」後熬過二年不到的國際孤立。²²凡此皆促使台北在八〇年代以後

註16 有關中華民國武器裝備發展的階段劃分，請參閱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八月三日，第四版。

註17 由此引發的「戰力空隙」理論，請參見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四版，與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三版。

註18 民國七十六年五月迄民國八十年十月十二日，空軍失事飛機共三十四架。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三版，與十月十三日。

註19 聯合報，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十六日，第二版。

註20 有關比較伊科二國與台北和平的文章，請參閱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十版，八月三十日，第十版，和十一月十五日，第二版。

註21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一月二十日，第十版。在伊國入侵前夕，中華民國部隊收到戒備指令，以防範中共的可能動作。當聯軍向伊拉克進攻時，中華民國政府要軍隊嚴防中共乘機奇襲。聯合報，民國八十年二月九日，第六版。

註22 青年日報，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五日；聯合報，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十六日，第二版。

開始大規模、而且強調建立自主的軍事現代化。

如前所述，中共的國防現代化不是因應台北的軍事現代化而來。振衰起敝為其國防現代化的主要認知。中共軍人於「文化大革命」時過度涉入政治，²³使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建立的制度、規章與體制全遭破壞，嚴重影響其整體戰力。這個現象在一九七九年「懲越」戰爭失利表現無遺，使中共認知到亟需振興軍力以維護其作為大國的形象。

中共的這個認知因工業先進國家的軍事表現而增強。最常被中共援引的例子為美國襲擊利比亞強人格達費：以精密電子設施偵測格達費的行踪，再以空中加油技術調集遠地的戰機，用機上的精密導彈進行襲擊。同時，全過程中指揮、管制、溝通與情報一氣呵成。²⁴中共當局由此得知其與先進國家的差距，與其武器裝備之不足。

在武器發展方面，中共軍方認為，未來的發展有幾個方向，分別為隱形化：使敵方不能或不易偵測到己方行動，利於己方發動突襲，使敵方無法有效防守；精確制導化，使武器能由遠地直接打擊敵人目標，減少己方損失，又具有機動性和反應能力強的特性；電子化：使指揮、管制、通訊和情報系統成為可能，也使導航、遙控、遙測、遙感更進步，更使電子戰成為不可或缺手段；智能化：使武器「自主」能力提高；聚能化：使傳統武器的殺傷與破壞效果大幅提高。²⁵凡此皆涉及當今所有高科技的主要領域。

近期的波斯灣戰爭更刺激了中共軍方要迎頭趕上的雄心。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以高科技的武器與優越的組織，徹底擊潰伊拉克的武力。這使中共軍方非常驚訝高科技武器的威力，相當加強了中共內部加速國防現代化的共識。²⁶甚而，波斯灣戰爭相當扭曲了中共內部政治生態，使強調現代化的呼聲提高。²⁷

世界局勢的鉅變對中共加速國防現代化有促進作用。前蘇聯的解體與撤出東亞，及美國的裁軍與逐漸撤回本土形成了東亞地區權力的真空。²⁸對中共而言，這是其成為地區大國的機會，以完成成為強國歷史的宿願。前蘇聯的解體與主要工業國

註23 有關中共軍人介入政治衝突之研究，請參閱齊茂吉，五〇年代至八〇年代由中共內部派系鬥爭探討其軍事路線之演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註24 趙和惠與蘇向東，「局部戰爭小型化」，世界知識（北平），一九八八年，第四期，頁一三。

註25 汪慶榮，「高科技的發展對國防現代化的影響」，中國軍事科學（北平），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引自複印報刊資料（北京），軍事類，一九八八年，第九期，頁三〇～三三。

註26 丁樹範，「波斯灣戰爭對中共解放軍的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四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年十二月），頁二七～三六。

註27 June T. Dreyer, "The Role of the PL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paper read at the 33rd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Virginia, USA, November 1991.

註28 劉向群，「海灣危機對東西方緩和及世界局勢的影響」，國防（北平），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頁二～三。

國家的裁軍可能加速軍事高科技與高科技人力在全球的擴散，²⁹使中共能以較低成本進行軍事現代化。也就是說後冷戰時代對中共而言，是一個良好的機會，雖然中共也面臨政治繼承與經濟發展等內部問題。

後冷戰時代軍事衝突性質也促使中共欲加速國防現代化。後冷戰時代世界大戰雖不會爆發，但局部（有限）戰爭將更激烈，而且戰略、戰役、戰術幾乎合一而難以區分，³⁰這使中共更加重視軍隊建設與現代化，以求在戰爭初期就能取得優勢。同時，全球有一種趨勢出現，即對地區性衝突與潛在威脅，以快速打擊武力用軍事方式直接解決。³¹此外，世界各國在後冷戰時代雖大力裁軍，但各國軍力的質量不但不減反而有所提高，這使中共相信，其必須加速國防現代化的脚步。

中共加速國防現代化的信念可以兩個例子為證。其一為中共公布的一九九二年度國防預算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三點八，達到六十八億五千萬美元。增加的額度與往年用以作為增加軍隊的福利不同，而是用於武器與科技的採購。³²其二為中共在不久前公布的科技政策中，也包括了欲優先發展軍事技術，內容有核武彈頭、材料、電子電腦、與光電技術等。³³

從某個角度而言，中共軍事現代化現在是以其在世界地位為主要著眼點，³⁴而掌握了後冷戰時期有利契機，希望使中國大陸成為強權之一，以迎接世界多極化的來臨。

三、軍事現代化的成果

兩岸在不同的出發點下，同時進行了性質不同的軍事國防現代化。台北進行的主要是以武器裝備為主，而北平進行的則包括了範圍更廣的國防體制的重組，與武器裝備的更新。本節擬討論雙方的武器裝備面。

中華民國武器裝備現代化的範圍包括了防空、制海，與反登陸三方面，而以前二者為主。國防預算在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在經濟成長支持下大幅增加。例如，從一九八六年起，國防預算為四十五億四千萬美元，至一九九一年，此數字增加到九十二億九千萬美元，增加了百分之百。

註²⁹ 有報導指出，中共已僱用二百位（也有二千位的說法）蘇聯核子科學家協助其核武的現代化。中共問題資料週刊，第五二八期（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十一日），頁五六。

註³⁰ 大陸軍方對此的看法，請參閱李乾元與尹迪春，「未來局部戰爭中合同戰役初探」，國防大學學報（北平），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頁四九～五〇。

註³¹ 俄羅斯海軍上將希道夫（Sidorov）於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台北的公開演講。

註³² 與駐北平外國軍事武官訪談，一九九二年四月。

註³³ 華文，「中國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發展宏圖」，瞭望（海外版），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日，頁一一～一三。

註³⁴ 中共以敵對國家中最強者為戰略目標。參見彭維新，「戰區發展戰略與主要作戰對象的關係」，學術研究（南京），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十一月十五日），頁一五～一六。

單位：10億美元

年份	金額
1986	4.54
1987	5.91
1988	6.70
1989	8.18
1990	8.69
1991	9.29

資料來源：Military Balance, 1987~1992.

防空武器裝備方面，從一九八〇年代初就開始研製的經國號戰機（IDF）為最著。使用已多年的 F-104 與 F-5E 在雷達設備有更新，並進行了延壽計畫。飛機上的武器配備方面，有進口的 AIM-9L 近程空對空飛彈，與 AIM-7 中距離空對空飛彈，及自行研製的「天劍一型」近距離與「天劍二型」中距離空對空飛彈。

在地對空防禦方面，自行研製了「天弓一型」近距離與「天弓二型」中遠程防空飛彈。原由美國購入的「勝利女神」與「鷹」式防空飛彈的數量則增加了一倍，形成嚴密的防空網。此外，代號為「天兵」的防空作戰系統也建立起來了。能全天候、快速反應對低空目標構成強大的殺傷力。

在防空的指揮、控制、溝通與情報系統方面，中華民國有「天網」與「強網」系統，可自動接收和傳達各雷達站的情報，並能提供各種戰術數據，而選擇防空兵器。其最多可同時顯示四百批空中目標，引導四十批戰機進行空戰。此外，台北購買了四架 E-2C 空中預警飛機，以及一些新雷達，大幅度提高了防空預警能力。

在制海方面，現代化的措施範圍也非常大。向荷蘭訂購的二艘潛艇已服役，且有增購新潛艇的計畫，以增強反封鎖與反潛的制海能力。其他反潛設施還包括可隨軍艦執行任務的 MD-500 反潛直升機、S-2E 和 P-3C 反潛巡邏機、與 S-70C 反潛直升機。在大型艦艇上，也配備了各種反潛魚雷、與反潛火箭等武器。

主力艦艇方面，台北將購買技術研製十六艘美國派里級巡防艦，購買法國拉法葉級巡防艦十六艘，及向美國租用十至十六艘諾克斯級巡防艦，以充實主力艦陣容。此外，對既有的十六艘驅逐艦則予以全面更新，包括船用引擎到武器系統，以提升戰力。

在支援艦艇方面，有新型補給船的成軍，有新向德國購入的獵雷艦加入，及向美國購入的遠洋拖艦。在巡邏艦艇方面，近二十艘由五百噸到一千五百噸者已陸續研製購入中。這些巡邏艦艇有相當強的火力、偵測與通信系統。

海軍方面的指揮管制通訊情報系統也已組建。這使海岸間、艦艇間、與岸艦間自動化的指揮網得以建立。配合各艦艇上的偵測與作戰系統，制海任務更容易達成。

再加上反登陸武力與壓制武器，如「工蜂」多管火箭等的部署，都是自行研發的武器。一些觀察家推測，中華民國十年後的防衛力量將超過中共，因為台灣擁有資金與技術，³⁵儘管台灣自行研製的武器面臨不少的瓶頸與問題。甚而有人認為，台灣的軍事技術領先中共十年。³⁶有人因此擔心，台北軍事力量的增強將使南海與釣魚台列島問題變得更複雜。³⁷

註35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六版。
 註36 Newsweek, December 23, 1991. 引自經濟日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37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六版。也因為台北處在軍備轉換期，有人擔心此刻為軍事安全的危險階段。

中共的武器裝備現代化則處於比較晦暗不明狀態。一方面，其不是民主政體，不受議會監督。另一方面，中共強調自力更生，不願向外大量採購。而且，保持晦暗狀態使人覺得高深莫測，而不敢對其有所動作。因此，外界難以真正了解中共武器現代化的狀況。

另外，面對世局的改變，中共對武器的研發有了新的想法。他們認為，如果世界大戰打不起來而能保有相當長的和平，那就不須急著將新研製的武器大量生產。相反地，可以採取「多科研、少生產、加強試驗和試用」的策略，^{③⑧}以逐漸累積技術，並節省大量生產的資源。在此策略下，中共武器現代化很可能在研究、發展、試驗與試用成功後，除大量對外軍售，以測試性能而曝光外，外人難以了解其武器現代化的狀況。

在制空方面，中共從七〇年代開始發展的殲八乙型戰機為最著。特別在八〇年代中期，中共與美國達成協議，由格魯曼飛機公司以五億五千萬美元為其設計新的射控、雷達與導引設備，以裝配在五十架殲八乙型上。^{③⑨}此協議於一九九〇年五月為中共中止，因為中共擬以自行研製的射控系統裝配在此機上，以避免再為外人控制其武器現代化。^{④①}

其次為殲七「空中衛士」戰鬥機與強五對地攻擊機。「空中衛士」為中共更新米格二十一而來，裝配了外國進口的雷達、無線電、敵我識別系統、電腦等，但以出口為主，自己部署的不多。「強五」則為米格十九的翻版，一九八六年，中共與義大利一家公司簽約，裝配了該公司製造的飛航系統與中共新研製的引擎，但中共迄今未大量部署此型機，而以出口為主。中共不大量部署此二機的理由，西方有二種推測。其一為財政理由。製造此二機的航空工業部為了創造外匯收入，要求中共空軍以外匯支付機款，而中共空軍僅由總參謀部取得人民幣的採購預算。其二，此二機的機身是以六十年代，甚至是五十年代的設計為主，而有先天難以突破的限制，不合九十年代的需求。^{④②}

近年有關中共發展新機種的傳聞不斷，但始終未有測試或試飛的消息。例如傳聞中的殲九、殲十、與強轟七即未有新動向。

註③⑧ 張愛萍，「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紀念人民解放軍建軍六十周年」，人民日報，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頁一與四。

註③⑨ 有關此協議之形成，請參閱裘兆琳，「中美及美國與中共政治、軍事關係演變」，裘兆琳編，中美關係報告，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八九年），頁一七—二一。駐北平的西方外交官認為，美國同意此協議之政治作用大於實質軍事作用。一九九一年四月訪談。

註④① Richard J. Latham and Kenneth W. Allen, "Defense Reform in China: The PLA Air Force,"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1, p. 47. 此處有關中共三軍與戰略核武之現代化分析，除另有註釋外，概引自 Robert J. Siebo, Gregory K. S. Man and George H. Stevens, "Chinese Military Capabilit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Prepared by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S. (D. C.: GPO, 1991), Vol. 2, pp. 663~675.

註④② Latham and Allen, 同註④①。

中共在研製運輸機方面則有相當進展，同時正設法將新出廠運輸機改為軍用。^{④2}大、中型運輸機方面，運八可運九十六名武裝士兵或五十八名傘兵。西方消息指出，中共擬將運八改為空中加油機、空中預警機、與巡邏機。中共也仿波音七〇七試製了運十，及與美國麥道公司合製 MD-82 飛機。中共研製了運七，以為中型運輸機，可乘坐五十人左右。然近因引擎問題，運七已被停飛。可載十餘人的運十二與八人的運十一為小型運輸機。

中共鑒於自身研發能力的限制，不願受制於西方國家，以及蘇聯國防工業的轉變，乃自一九九〇年起積極向前蘇聯購入新戰機。除已購入的一中隊 SU-27 外，近日盛傳中共擬以授權生產方式另外購入二中隊。此外，消息也指出，中共正與俄羅斯談判購買米格三十一。中共的俄式工業傳統使其比較容易吸收蘇聯的技術。

中共也由其友國取得先進戰機與相關設備，以自行仿製。波斯灣戰爭期間，中共派了國防科學工業委員會負責人丁衡高赴伊朗，取得了一些由伊拉克飛到伊朗的飛機，包括 SU-22、SU-24、SU-25 等供其仿製。^{④3}伊朗據傳也提供了空中加油設備給中共。^{④4}

海軍方面的現代化狀況與空軍相似。能載潛射核彈的「夏」級潛艇，自第一艘服役以來，擴建的傳言不斷。最近的消息是，中共已放棄建造更多「夏」級潛艇，而計劃更大更現代化的核潛艇。^{④5}中共或想以俄羅斯核武器專家與其他材料技術^{④6}的知識以求突破。「漢」級核子攻擊潛艇與「羅密歐」級柴油潛艇則裝上了七〇年代的武器與偵測儀器。

在主力艦艇方面，中共設法以自己設計或向美國購買的汽渦輪引擎、電子設備與武器提升現有主力艦艇的戰力。西方情報指出，中共已完成二艘「旅大」級驅逐艦的現代化改裝，同時在至少四艘戰艦配備了直升機，使之具有反潛、衛星導航與艦對艦飛彈的能力。西方消息也指出，中共選在上海製造二艘更大的驅逐艦。此外，中共也改良了一些巡防艦的動力與電子設備，以增強戰力。^{④7}中共在過去幾年中組建了一支包括八十艘掃雷艦的部隊。

前蘇聯解體後，盛傳中共有意購買俄羅斯的小型航空母艦與烏克蘭船廠中正在興建中的大型母艦。稍早，中共也設立了訓練航空母艦的課程以培養人力。無論如何，這顯示中共發展遠洋作戰的能力與願望。

註④2 慧峰，「大陸飛機製造、維修工業概況調查」，中共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七期（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十五日），頁九一—一〇五。

註④3 Tai Ming Cheung, "More Punch for the PLA: Fight Jet Deal Boosts Sino-Soviet Military Ti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 April 11, 1991, p. 18.

註④4 "Fuelling Speculation," *FEER*, February 21, 1991, p. 9.

註④5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1-1992, p. 149.

註④6 華文，同註④5。

註④7 Tai Ming Cheung, "China's Regional Military Posture," *International Defence Review*, June 1991, p. 620.

此外，可移動的M-9與M-11地對地飛彈為八〇年代中共研製的最有名武器。二者的原型彈已在一九八六與一九八八年展示。此二飛彈主要以出口至巴基斯坦與敘利亞為主，中共本身未有部署的消息。前者射程有六百公里，而後者則有三百公里。

整體而言，中共傳統武器現代化的進展不若其「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來得大。資源分布不均為因素之一。依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估計，中共實際的國防預算應為其公布的二點五倍，而由一九五八年開始的二十多年中，實際預算的三分之二用於「兩彈一星」，^⑧這必嚴重妨礙其傳統武器的發展。中共社會主義體制的後遺症，包括研發與生產部門的脫節，不鼓勵創新與缺乏承擔風險的誘因，及研發資源管理與協調的不良，^⑨也束縛其進步。

四、結 論

台海兩岸的軍備競爭呈現不對稱的發展。中共是以區域、世界地位，以及近代歷史的使命感——使中共「強」與「富」——為主要考慮點，其軍事現代化有其內在動力。而台北則純以中共可能的威脅為主要著眼點，會依中共的軍力做調整。這個不同的考慮使兩岸軍備競爭不可避免。

兩岸間持續的不信任加劇了軍備競爭。一九八七年十月以來，兩岸互動關係雖然進入新的階段，但中共始終抱持「一國兩制」，在全世界扼殺中華民國的生機。這迫使中華民國政府繼續投入相當多的資源於武器的現代化，雖然軍事終究在未來兩岸關係中會扮演什麼角色仍不確定。

然而，兩岸間的軍備競爭似不會引起即刻的軍事衝突。中共由於軍事現代化仍未成功到有把握在第一擊中打敗台北，美國仍在此區域有一些影響力，以及中共由現行的對台政策中仍能成功地對台灣發揮相當大的壓力，使兩岸軍事衝突不致發生，雖然不能否認中共或會測試我們的防衛能力。這也就是說，兩岸軍備競爭間的敵意性在目前仍不是很強烈，雙方各有不同的考慮，但此軍備競爭却具有長期不可忽視的意義。

^{註⑧} Ed. Parris, "Chinese Defence Expenditure, 1967-1983," in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Vol. 2: Economic Openness in Modernizing China*, Prepared by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S (Washington D. C.: GPO, May 1986), pp. 148-168.

^{註⑨} Jonathan D. Pollack, "The R&D Proces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ystem," *Rand Report*, R-3284, May 1985, p. 7.